

100908

赵庚奇

志鉴论稿

北京出版社

赵庚奇志鉴论稿

赵庚奇 著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序	段柄仁 (1)
弁 言	(1)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 (辑录整理)	(1)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与地方志 (辑录整理)	(7)
探讨方志理论 交流修志经验 ——《北京地方志》发刊词	(30)
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	(32)
按照方志性质做好《北京志》的编纂工作	(41)
修志是一项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61)
关于提高北京地方志编纂质量的若干问题	(66)
质量是志书的第一生命	(87)
继承·创新·求实	(91)
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稿政治质量 方面的二十个问题	(111)

关于志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他·····	(154)
政治部类志书也应横分门类	
——关于地方志政治部类篇目设计	
问题的探讨·····	(167)
对中共创始人和领导人事迹的记述要准确·····	(179)
关于修志的质量与速度的关系问题·····	(192)
修志事业为什么能够绵延不断历久不衰·····	(204)
资料要详加考证 记述要符合志体	
——对《北京志·劳动志》(报市审查稿)	
的审读意见(摘录)·····	(238)
县志要加强整体性记述	
——对《怀柔县志》(报市审查稿)	
的审读意见(摘录)·····	(247)
志书记述要符合宪法和法律	
——对《房山区志》(报市审查稿)	
的审读意见(摘录)·····	(260)
关于确保志书质量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西城区志》(报市审查稿)	
的审读意见(摘录)·····	(272)
喜读《商丘地区土地志·夏邑卷》·····	(291)
关于《北京市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	
(1989—1999)的意见·····	(296)

关于在《北京志》和区（县）志编纂中涉及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陈王案件 记述问题的意见.....	(299)
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编纂出版工作中 若干具体问题的53条处理意见.....	(303)
关于《北京志》各卷（册）编委会名单 排列顺序的意见（摘要）.....	(315)
关于《北京志》主编、副主编的任务和 报市审查稿的审批程序的意见.....	(317)
突出首都特点 做好《北京年鉴》编纂工作.....	(319)
关于年鉴编辑的理论与实践.....	(331)
《北京年鉴》编写注意事项60条.....	(376)
忆修志工作的老领导王立行同志.....	(383)
北京修志十年.....	(389)
《北京年鉴》编辑出版十二年.....	(407)
1958—2001年北京修志、年鉴工作纪略.....	(424)
附录：	
未收入本书的志鉴文稿目录.....	(482)
赵庚奇工作简历.....	(488)

序

段柄仁

这是一本专著，是一本可贵的、难能的、把实践的开拓和理论的创新融为一体的有关方志编纂学的专著。

说其可贵，首先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规模开展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20 多年来，很少见到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这方面实践经验的专著，它不仅是北京市的一项方志学拓荒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方志学研究领域增添了一枝色彩鲜艳的新品种花朵；其次，它的内容大多是针对新方志编纂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发的，具有鲜明的借鉴性和指导性，不仅对修志事业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的意义有具体的阐述，对新方志的编纂特点和方法有明确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对编纂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难以下笔的诸多问题，类似重大政治事件、涉外事件、民族宗教和人物入志等敏感性问题，做了有理有据的比较妥善的回答，其中《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稿政治质量方面的二十个问题》在发表前已被广泛传播，被一些方志编纂工作者称之为“及时雨”式的论文；第三是目前第一轮新方志的编纂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已大体完成，

第二轮编纂工作正在启动，这个时候急需对第一轮的编纂经验进行总结，并提炼升华为比较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下一轮的编纂工作，以便正确认识新形势，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进下一轮修志工作的深入、健康、顺利发展。这本专著的问世，必将对方志的编纂和方志学的发展，起推动和导向作用。

说它难能，是因为这样的专著不是任何人都能出手的。它需要长期的工作积累，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更需要勤奋好学和眼勤、脑勤、手勤。作者赵庚奇同志做过政策、理论和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工作，从北京市地方志编纂的筹备工作一开始，便参与领导工作，现在仍然担任《北京志》和《北京年鉴》的常务副主编，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北京地方志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北京新方志的开拓者之一，年愈古稀仍然全身心奉献于方志的编纂工作。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使他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形成了认真细致、勤奋思考、笔耕不辍的工作习惯。他研究民国北京史，写了一系列拾遗补缺性的论文，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担任《北京年鉴》常务副主编，又专心探索年鉴编写的规律性问题，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和一定理论深度的论文。他从事方志编纂工作后，广泛涉猎了有关书籍材料，汲取并记录实践中的点滴经验和新问题、新发现，积少成多，博观约取，而成此书。正如古人所言，“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垂大名于万事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本专著是他 20 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把实践的开拓和理论的创新融为一体，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只要翻翻本书的目录，这个特点就可一目了然。书中收录的有关方志编纂和《北京年鉴》编写的数十篇文章，从作者于1983年5月执笔起草《关于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情况向市委宣传部并市委常委的报告》，到2002年写的《北京修志、年鉴工作纪略》，多是北京地方志开拓者们实践的记录。其中包括了宣传修志重大意义的舆论工作，制定工作规划，成立机构，组建队伍，建立制度等组织工作和工作的方针、原则等指导性意见，几乎是北京修志工作全过程的实践情况，同时还选用了四篇作者对志书的审读意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市方志编纂步履维艰的踪迹，体会到编纂者们耕耘的苦与乐。与此同时，作者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理论探索也跃然纸上，包括新方志的属性、特点、功能、结构、体例和记述方法、质量标准、规范、人物以及新方志组织领导的基本经验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述。特别是政治质量问题，不少是创新的见解。这些，对进一步开拓方志的理论研究、发展方志理论，提供了启示和榜样。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预祝作者古稀之年在方志编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发出更加耀眼的热和光。

2002年11月

(序言作者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主编)

弁 言

1998年，几位老同志建议我将志、鉴、史旧稿进行整理，结集出版；北京出版社有关领导也欣然同意。由于当时工作繁忙，无力顾及此事，就一直拖了下来。

四年过去，2002年5月至7月，我因病住院和术后休养期间，重新考虑此事，觉得拙稿对实际工作可能还有些参考价值。遂着手翻检、整理旧稿，选出32篇。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20年来，我参加了北京修志十年酝酿、十年行动、陆续出成果三个阶段的全过程。在修志各个阶段，都提出不少方志编纂理论和修志实际工作方面的问题。在评议和审读志稿时，又发现在志稿质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外事、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个领域，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客观的实践逼着我面对难题，不断思考，不断进行一些研究。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本书所选收的文稿和起草的文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回答和力求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而作。反映了我作为一个老的修志工作者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我一生工作最后阶段20年所从事的志鉴生涯的真实记录。至于我对志鉴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某些在方志学界有重大争论问题的见

解，还希望得到志界同仁的指教。

目前，北京地方志上一轮的编纂工作即将基本完成，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即将启动。本书的出版，可能有助于修志同仁和一切关注北京修志的朋友们了解新中国建立后北京修志发展的历史情况，为回顾上一轮修志的经验教训，为续修志书的准备工作起一些参考作用。

从1986年9月至1999年7月的13年中，我一直主持北京市地方志筹备小组办公室和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共起草工作规划、规范、请示报告、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40多篇，这是我的职责要求必须完成的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它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但是，应当说明，这些文件都先后经过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明义、王立行、段柄仁或办公室主任王国华同志的审查把关，有些是经过《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或《北京志》常务副主编会议讨论后定稿的，有些还吸收了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有关同志以及市级有关部、委、办、局（总公司）和区（县）修志同仁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正是在领导同志和修志同仁、专家学者的提示、指教、发言和争论中才使这些文件逐步形成和比较完善，因此，它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这里，我深切怀念老领导王立行同志，他于1998年4月底至5月初，连续5天主持《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主要讨论我起草的《北京志凡例》、《北京志篇目》和《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编纂出版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53条）。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

他为这些文件的形成和定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作为《北京年鉴》常务副主编，连续12年主持编纂和终审工作，积累了一些实践的经验，同时也结合年鉴编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些研究，写了一些文章，在本书中选收4篇。

1987年，北京市社科院主办的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创办中国方志学系，我任常务副校长兼中国方志学系主任，学制二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籍学员3200余人。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省、市、县三级志书主编、副主编。在曹子西校长的领导下，我参与组织编写、选定教材和参考资料10部，创办了方志理论刊物。还邀请北京和全国各地21位领导、专家、学者在京授课，为各省、市、自治区培养出大批修志人才。在本书的北京修志和年鉴编写工作中作了一定的反映。

本书的出版得到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负责同志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段柄仁同志拨冗为本书作序，并热情给予鼓励和支持。市政协原副主席甘英同志热情提供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于50年前亲自为市委政策研究室部分同志拍摄的珍贵合影，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张放同志和美编张中华同志。他们在编辑和设计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毛泽东爱读地方志

(辑录整理)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到晚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一直酷爱读书，注重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要做两方面的调查，即除向有关人员调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外，还要了解当地历史沿革、山川气候、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等。而地方志就是记述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因而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青年时代，毛泽东查阅过《安化县志》，浏览过不少地方志。1927年10月，毛泽东从工农红军中挑选茶陵籍18岁的战士龙开富（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专为他挑书箱。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每攻克一地，立即搜集地方志。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途中，由汪东兴等陪同，下榻到了阔别38年的故地茶陵，住在中共茶陵县委常委办公楼，派人向县委要来《茶陵州志》在卧室里阅读。^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每打下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当地县志看。1930年，红军打

下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住在县图书馆内。当时的少共兴国县委书记萧华^②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兴国县志》。后来，毛泽东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帮助找来清朝修的《瑞金县志》，爱不释手地挑灯夜读。长征途中，天上每日几十架敌人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国民党政府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毛泽东也未放弃他阅读志书的习惯。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说不是这个，秘书有些不解。毛泽东说：“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府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毛泽东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以后，每到一地，都去找地方志书。毛泽东经常教导说，打胜仗贵在知情势，如果把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土民情掌握好，就可能取得胜利，而这些情况在地方志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书搜集得越来越多，但在当时那样紧张、频繁战争的环境下，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毛泽东只能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阅读，读后就只好忍痛扔掉。直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些地方志书，对当时扔掉的地方志书十分惋惜。^③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就包括“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毛泽东重视收藏地方志书，在中南海丰泽园书斋内，藏有不少省志、府志、县志，随时查阅。^④因此他对很多地方的历史情况十分熟悉。廖志高回忆：“1950年某次会议上见到毛主席，他问，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我说不知道。主席说：是唐朝开发的。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毛主席说：是看你们的县志”。^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据1945年中共“七大”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二十年之久的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⑥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不少是地方志书。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开封，住在河南省军区司令部小楼上。晚上，毛泽东翻阅了《河南通志》和《汴京志》。在广东汕头市，他看了《汕头县志》、《潮州府志》。有一次，毛主席到无锡市的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

1958年3月4日至27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他一到这个蜀汉古都，就要身边工作人员到图书馆，借来《华阳国志》、《四川省志》，随后又借来《灌县志》等，仅《四川省志》就有100多本。毛泽东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阅读这些志书，连《武侯祠志》也读了；他还将《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灌县志》中的《都江堰》以及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印发给与会同志，要求大家了解这些历史情况。^⑦3月21日下午，毛泽东还视察了都江堰。在同部分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毛

泽东倡导修志。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当时北京和很多省开展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同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一到安徽省会合肥，就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阅读，了解安徽历史情况，并向同来的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⑧

1959年7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于6月30日清晨到庐山。在他的会客室里，工作人员按照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摆好了他所需要的书籍。毛泽东浏览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名，便问随身秘书，这里有没有庐山的志书，秘书回答没有准备这类书籍。毛泽东说：“能否借一部我看看。”随即由大会办公室文娱组组长、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林敏向庐山图书馆借来一部方志学家吴宗慈于民国时期编纂的《庐山志》呈送。毛泽东看了看目录，便说：“最好还把《庐山续志》借来。”有关同志又把此书借来送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同身边同志谈庐山的历史。毛泽东看后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全都记录下来。当时梁实秋^⑨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此人现在哪里？”在场的一位同志回答：“抗战中他在重庆，1949年去了台湾。”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当时，毛泽东还向在座的同志谈了一个典故。说历史上朱熹曾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朱熹下轿开口便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

莫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车伊始问志书”的由来，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①

1955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在巡视黄浦江时说，上海有个下海庙。大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县志》上查到有关记载。他曾向长期在江西工作的方志纯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在《铅山县志》中找到了。^②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到过杭州，每次在工作之余总要查看当地的志书，对浙江的许多地方典故了如指掌。有一次，他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回答是“浙江海宁硤山人”时，毛泽东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硤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等等。^③

【注释】

①陈万美：《毛主席关怀茶陵图书发行工作二、三事》，载1993年《湖南出版工作》。

②萧华，江西兴国人，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

③黄友风（解放后曾任总参某部部长）：《毛主席喜欢地方志》，载《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4期。

④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⑤廖志高：《回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廖志高，西康冕宁人（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⑥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载《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⑦四川日报编辑部：《新闻工作者要重视文化遗产》，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新华社记者师文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之余》，载1978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

⑧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1991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张治中，安徽巢湖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⑨梁实秋（1903—1987年），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任教，长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写作，鲁迅曾对他进行过批评。

⑩殷荫元（庐山管理局志办）：《毛泽东看〈庐山志〉》，载《江西方志》1989年第4期。

⑪《毛泽东重视利用地方志》，载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地方志》。

⑫魏桥：《新方志编纂简况和基本要求（提纲）》，载《浙江方志》，1993年第4期。

（本文原载《北京地方志》1993年第2—3期，收入本书时曾作补充）